学术专论

《群经平议》版本通考：以俞樾手稿本残卷为重点论述

孟巍隆

［**摘要**］北京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分别收藏了俞樾《群经平议》的稿本残卷，都是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罕见版本。二单位所藏稿本内容不重复，可以互补，加起来约相当于《群经平议》三分之二。稿本与通行刻本内容大同小异，然而其中不同之处，对于校勘、整理与阅读《群经平议》则大有裨益。本文在梳理探讨各版本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从而揭示此两个手稿本具有很高校勘与文献价值，能够纠正通行刻本《群经平议》的若干文本错误，进而有助于理清俞樾的经学思想。

［**关键词**］群经平议　俞樾　稿本　经学　版本学　校勘学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7）－01－0033－12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是清末颇有影响力的经学家与文献学家，专心于经学、小学、文字学的攻究。常与黄以周、孙诒让并称晚清朴学三大家，也是章太炎的老师。其主要著作是《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个人别集《春在堂全书》。

俞樾自称继承乾嘉学术运动段玉裁与王念孙、王引之之余风，亦即所谓段王之学，重视小学知识、考证方法。其著述刻意仿照高邮王氏之书（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如其《群经平议》仿《经义述闻》，《诸子平议》仿《读书杂志》，沿用其体例而弥补所缺。《群经平议》35 卷，是近代经学巨制，着眼考证文字的形音义以及古人著书行文的惯例，对经书中难懂难通之处加以阐释。其说法虽然不尽善尽美，但仍然是经学研究必备之书，富有极大参考价值。

一、基本评价

后人评价俞樾及《群经平议》，大抵属于好评。徐世昌《清儒学案》如此形容俞氏之学风："曲园（俞樾）之学，以高邮王氏为宗。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而务为广博，旁及百家，著述宏富。"①俞樾的《群经平议》在格式、宗旨上皆仿照王引之《经义述闻》。至于《群经平议》此书，学者杜季芳如此称赞其文献成就："《群经平议》的长处主要在于校，而不在诂。'校'有多种途径，而利用善本书进行校勘是其中的一种。俞樾尤其善于以善本为依据作校雠。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为基础，以类取，以类予，这是一种活的校勘。另外，他还利用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疏

［**收稿日期**］2016－09－22

［**作者简介**］孟巍隆（Ben Hammer，1977－），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济南 250100；benkhammer@ sdu. edu. cn

①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 183，北京中国书店刷印本，据民国二十八年刻本，第 1 页。

通文异而义通的词语，阐述了许多假借字的渊源关系，为从事校勘、训诂的学者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材料和经验。”① 除了注重善本的运用以外，俞樾之所以如此擅长勘正、训释古书是因为他尤其精于古文文法与词义之学。他读经读子向来特别重视词义的甄别、语义的解析。② 其《古书疑义举例》便是这一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但《群经平议》并不是天衣无缝的经学著作。近年来有专门论文批评《群经平议》的校勘、训诂不足之处。③ 早在民国时期梁启超比较《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二书而声明俞书“全应用《经义述闻》的方法，继续有所发明，价值也仅下《经义述闻》一等”。④《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条曰：“亦有强立新义，而仍与旧说无大异者。又有经注极明晰无疑义而故求曲说者。然穿穴证佐，皆有心思，终胜无本空谈也。虽指其短，不没其长。洵足以为定评焉。”⑤ 今语言学家唐子恒有类似评价并分析其理由道：“在研究方法上，俞樾一心效法高邮王氏。但在俞樾的时代，经书经乾嘉学者们考订原文，广搜古注，反复研讨，其疑难讹误之处已剩不多，所以《群经平议》的成就便难与乾嘉学者相比。而且随意破字改字、以己意疑经而无显证的倾向也比乾嘉学者明显。”⑥

学者们所说的俞樾不如二王这一点，需要做进一步阐释。俞樾对古经旧注的校勘和注释，有的颇具真见卓识，有的则显得牵强附会。牵强的那一类，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往往显得多余，可有可无。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其注校风格：在古经古注的文字与文义不存在明显语病的情况下，俞樾还要提出新的读法。这新的读法能读得通，但是传统读法也通，因此不好拿准孰是孰非，很难采用俞氏的新诠释来驳倒、代替旧的。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论语·学而》首章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般的理解是，有朋友从远的地方来，不是快事吗？从文字的运用和文意的理解上，这里没有问题。但俞樾对此有新的见解。他引用陆德明《释文》、阮元《校勘记》、洪颐煊《读书丛录》等书说明“有”字或作“友”。还引《说文》、《淮南子》、《尚书》、《史记》表明“方”可训为“并”。如此一来，《论语》的这个名句意为“友、朋自远一并到来不是快事吗”。这样诠释虽能说得通，但何必推翻旧注？旧注通顺，也无害大意，新解的贡献真不大，最多只能供读者寻味而已。

又《群经平议》卷 25 考证《春秋左传》的内容，其中一条考查隐公十一年“序民人”一句。俞氏平议曰：

> 樾谨按：“序”当读为“豫”。《尔雅·释地》、《释文》引《春秋元命苞》曰：“豫之言序也。”《礼记·射义》篇：“卿大夫序从。”《郑注》曰：“‘序’或为‘豫’。”是“序”与“豫”古通用。《尔雅·释诂》曰：“豫，安也。”“豫民人”，犹言安民人。《正义》以为“次序民人”，非其义矣。

郭鹏飞曾评论过《群经平议》中的《春秋左传》一部分，对俞说持有异议。郭氏从《左传》本段的上下文入手，即“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再考之孔颖达的《疏》、《礼记·乐记》、《前汉纪》等文献，就俞樾的新解得出结论，说：“礼为天地万物之序，故能‘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孔《疏》释‘序民人’为‘次序民人’，相当合理。杨伯峻释此为‘使民人有一定秩序或次序、等级’，训解合乎礼治精神。高本汉亦有类近之说。俞

---

① 杜季芳：《试论俞樾的校勘学成就》，《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② 参见孙良明：《谈古文训诂中的语义关系分析—兼述读俞樾〈诸子平议〉、〈群经平议〉感》，《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 年第 3 期。

③ 可以参见罗雄飞：《俞樾校释群经、诸子的得与失》，《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6 期；王其和、王明春：《〈群经平议〉训诂失误举例》，《德州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3 年，第 228 页。

⑤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二册，中华书局，1993 年，第 1401 页。

⑥ 董治安主编：《经部要籍概要》，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248 页。

樾以‘序’通‘豫’,《左传》并无他例，且本字可解，不必言假借。”① 这种批评与上例无异，即原初的训释没有问题，俞樾如此“纠正”显得多余。确如唐子恒所道：“经书经乾嘉学者们考订原文……其疑难讹误之处已剩不多……（俞樾）随意破字改字、以己意疑经而无显证的倾向也比乾嘉学者明显。”

既然俞氏“以高邮王氏为宗”，则其经学思想也可想而知。他恪守传统汉学路数，从小学切入，破读古字的形音义以挖掘经旨。他曾谓：“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② 这种治学态度不但继承二王之余风，且可以溯源到更早的朴学家。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戴震对于读经之法有名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③ 戴震提出的几项治经重点，刚好都可以用来描述俞樾的治学方法：研讨经旨要从考察文字开始；考察文字必须熟悉许慎的《说文解字》及其“六书”之说；一个字的正确意义与用法还需通览群书，对该字持有融会贯通的认识。甚至明末清初顾炎武更是有清以来经学鼻祖，他曾道：“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④ 由此观之，俞氏的经学思想与治学特点同顾炎武、戴震都有渊源关系。

二、版本介绍

《群经平议》有三个主要刻本。第一个是俞樾的个人全集《春在堂全书》本（以下简称《春在堂》本）；第二个是《续修四库全书》本（简称《续四库》本）；第三是王先谦等人编的《清经解续编》本（简称《续经解》本）。

这三者之中，《春在堂》本成书于同治十年（1871），是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本子。《春在堂》本问世后，接下来二三十年间有若干个《群经平议》的单行重印本陆续出版，但由于那些重印本均没有重刻及校订，即对原书未做文字方面的修改，所以实际上版式、样貌跟《春在堂》本一模一样。《续四库》本即属于这一类，它只不过是《春在堂》本晚期重印的本子。不过，《春在堂》本和《续四库》本还存有两个重要区别。《春在堂全书》末卷附有一个校勘记，这实际上是个刊误表。这个校勘记针对《群经平议》含有的四十九条文字的错误进行纠正。不言而喻，这对整理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可是，《春在堂全书》之后的所有重印本，包括《续四库》本在内，都未附带此校勘记。另一个区别在于二者之间的清晰度。《春在堂》本是最早刊发的，所以字刻墨迹都相当清楚。可到了《续修四库全书》印刷时，木板已经经受了多少年多少次的重刷再刷，可想而知有不少地方出现了磨损、破坏、漫漶等情况。

王先谦的《清经解续编》本虽是重刻了《春在堂》本，但其版式与样貌同《春在堂》本很不一样。就其文字内容而言，王氏等人对俞书做过小部分的修改，矫正了《春在堂》本原有的一些遗漏与谬误。但是通过比较研究便可以发现，更多的情况是，《春在堂》本原有什么错误，《续经解》本未察觉而沿用其误。更有甚者，《续经解》本还产生了新的错误（下文将细谈）。

目前，在以上几个刻本的基础上又有新印刷出版的《群经平议》精装本。1975 年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出版了《群经平议》影印本。该书没有标明版本信息，但根据笔者的考查，此本应当是照着早期的《群经平议》单行本而影印。按俞樾《群经平议》自序，在《春在堂全书》尚未编汇雕版之前，他先写了《群经平议》一书，于同治三年（1864）告成。河洛图书出版社的

---

① 郭鹏飞：《俞樾〈群经平议·春秋左传〉辨正五则》，2014 年第三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②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 183，第 1 页。
③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卷 9，戴震著，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40 页。
④ 《四部丛刊·集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 4，第 6 页。

影印本，因没有经过现代学者的校勘和整理，乃是《群经平议》最早的版本，因此其清晰度最高，并木板本身完整无缺，有一定的校勘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后来版本（包括《春在堂全书》本在内）的阙文、断版等情况。① 第二精装本是凤凰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春在堂全书》。这也是影印本，且影印视效不佳，故在文献整理方面没有新价值。第三是北京大学儒藏中心2014年出版的《群经平议》。该书是被整理过的排印本。整理者对木刻本做了不少校对勘正，发现了一部分旧的文字错误，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例如校对者没有参考现存的两个稿本，且没有参考原有校勘记，因此该书仍然保留不少文字错误。

三、稿本梗概

《群经平议》手稿本是残卷。《群经平议》共35卷，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手稿本只有全书中的15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另收藏有4卷手稿本。二者内容不交叉，正好可以互相补缺。（而且，由于两个本子的外在特征雷同，再加上内容可以互补，所以笔者坚信国图的残卷同华师大的残卷原属同一个抄本，后来才被拆开而分别收藏。）虽然残缺的内容仍然很多，但把现存的内容加起来，这19卷数的手稿本相当于全书的大半。这些材料非常珍贵：传世木刻本所存在的若干问题，诸如衍文、夺文、乙文、错字之类，一旦参考手稿本便得以解决，涣然冰释。对比木刻本与手稿本即可发现，《群经平议》最早的刻本（即同治早年的单刻本以及《春在堂全书》本）确实有不少刻错之处。这些误处，有的容易查出来，有的并不好察觉。往往只有参考手稿本方能发现木刻本有误，同时方知如何予以纠正。②

俞樾这个手稿本的外观特征非常讲究。稿本用宣纸，没有界栏和边框，但文字书写整齐利落。半页十行，一行二十字，行款版式特征十分一致。涂改、删节、增补等情况都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韩进从审美角度评论俞氏手稿本道："俞樾工隶书，以篆隶法写真书，行笔迟涩，字形方扁，端凝朴茂，自成一体。"③

细查稿本残卷，一个有趣的意外发现。俞樾写成此书，最初不叫《群经平议》，而命名《经训弼违》。"弼违"一词，查之古书，语出《尚书·益稷》："予违，汝弼。"伪《孔传》曰："我违道，汝当以义辅正我。"④ 书名初叫"经训弼违"，其意味与颜师古《匡谬正俗》同，意为纠正旧注罅漏之处。

稿本《群经平议》残卷有另一类别的价值，在于其新的材料。稿本《群经平议》有若干条目，经文、旧注与平议写成后全被俞樾删掉，结果刻工未加付梓，今刻本一律见不到。幸好俞氏删减文字有其固定惯例：或一个个的字上俱画方块，或整段文字一笔圈起来，以示删减。这样，

---

① 例如卷28的《国语》有阙文。"樾谨按：《礼记·祭法篇》曰：'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武王下有阙文"，云云。先查看《春在堂全书》的《群经平议》，就能看见印刷时所用的木板掉下来了一小块，就是"武王下有阙文"一句的前面是个空白，刚好缺两个字，连单边的线条也看不见。也因为此，《续修四库全书》本进行影印的时候，此处仍然是个空白处。王先谦编纂《清经解续编》时，重新雕刻俞书，在空白处便使用了两个大方块，"□□"，表示有阙文。由于所缺少的文字乃是俞樾本人的话而不是古书的引文，所以我们没法搜查原典加以补正。河洛图书出版社所影印的底本是更早的版本，我们从这个本子上查看卷28"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一条，能看到原文是："樾谨按：《礼记·祭法篇》曰：'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疑此武王下有阙文。"详见孟巍隆：《经学校勘释例：对儒藏〈群经平议〉文本的商榷》，《中国经学》2015年，文末最后一条例证。

② 参见孟巍隆：《"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评论儒藏本〈群经平议〉的版本选择》，《图书馆杂志》2015年34卷7期。

③ 韩进：《俞樾的〈春在堂全书〉稿本》，华东师范大学校报电子版2011年3月22日。（http：//www. cuepa. cn/cate_ 16/detail_ 29920. html）

④ 《十三经注疏》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即使是稿本上被刊落了的字样，仍然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这种“亡佚”的刊文，既对整理该书具有价值，又是了解俞樾治学风格与经学思想的宝贵材料，更是经学领域中难得的文库。

四、稿本与刻本之关系

就稿本与刻本之间的关系，首先需问，此稿本是否《春在堂》本《群经平议》上版付刻之底本？儒藏本《群经平议》的整理者认为不是，其解释是：“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群经平议》稿本二十四卷①，以其为残稿，且多勾画圈点删改之处，似属未定之本，故本次校点未予采用。”② 笔者却以为此稿本是底本之可能性比较大，分头胪列理由如下。

至于儒藏整理者提出的理由，即此稿本上涂改刊落之处多因此不是底本，笔者认为不成立。首先从理论上讲，任何手稿本写定之后再加修改，然后付之刻工雕版，没有什么不正常。具体对俞樾而言，这本鸿篇巨制，35 卷、40 万字的稿件手写完毕后，在原稿上稍加修饰即可，不必要也不大可能再度誊写 40 万字的清样。

其次，据现有研究，俞樾其他著作准备上版之前，他都会从原稿上加以涂改与刊落的提示，然后直接托付刻工。现代学者张燕婴曾对俞樾的《春在堂诗编》稿本（《诗稿》）残卷做过调查分析。彼稿本与《群经平议》此稿一样，多勾画圈点删改之处，然而张氏仍然得出结论：“取此稿与刻本《春在堂诗编》对校，知《诗稿》极有可能是《诗编》上版付刻之底本。”她之所以得出此论的论据是，第一，稿本对该书的上版格式做出提示，或者直接从原稿上涂写提示，或者圈去一部分文字而另加签条。无论哪种提示，刻工一律遵从之，到了《春在堂诗编》刻本上这些提示都得到落实。第二，稿本对诗作的字句重加整饬，这些改动都为刻本所采用。③

同样，馆员韩进专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校图书馆所藏《春在堂全书》现存的稿本，包括我们今天关注的《群经平议》残卷。华师大收藏的《群经平议》与国图的残卷一样多勾画圈点删改之处，尽管如此，韩氏论说：“馆藏俞樾手稿四种五册，包括《群经平议》……这四种手稿实是俞樾为《春在堂全书》写样、刊刻而誊录的底本的残本。”其理由同上文张氏相同，即这几种稿本都“有俞樾手写关于版刻写样的纸张、格式要求。……这些格式要求，在后来刊刻的《春在堂全书》中都予遵行”。④

今天我们所研究的《群经平议》稿本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因此我们对此稿本得出一致的结论：国图和华师大藏《群经平议》两个手稿本很可能是今所见到《群经平议》刻本的底本。

除了上述理论与两种旁证以外，《群经平议》手稿文本自身也可证明是稿乃刻工所采用的底本。《群经平议》卷 19 是考证《礼记》的篇章。此卷有一条专门研讨《檀弓》篇的“殡于五父之衢”这句话。俞氏的平议中有一段文字，刻本写着：“颜氏之卒，孔子必用殷礼殡于两楹之间。未得父墓，而又不敢久留母殡，故就五父之衢掘殡埋棺”云云。华东师范大学的稿本残卷有这一条，但在稿本上“未得父墓”之前有“因”字，当读为“因未得父墓，而又不敢久留母殡，故就五父之衢掘殡埋棺”。如此补正看似正确，“因……故……”乃是古文固定句型，加了因字便显得更加文从字顺。那么为什么刻本就少那一个“因”呢？是因为在这个手稿本上，此句前面原另有四个字，“及已迫葬”，连着写（又去掉标点符号）就是“及已迫葬因未得父墓而又不敢久留母殡故就五父之衢掘殡埋棺”。可在稿本上，“及已迫葬”四字已被俞樾用方块框起来，表示删去。紧接着的字—“因”—并没有画框删掉，但它本身是个带方块周边的字样，刻

---

① 笔者按，此数有误，国图稿本只存 15 卷。

②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群经平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8 页。

③ 张燕婴：《稿本〈春在堂诗编〉残卷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 年第 3 期。

④ 韩进：《俞樾的〈春在堂全书》稿本》。

工就看成五个框起来的文字，把“因”字连同遗漏不刻。这个现象其实可以视为一种新的校勘学规例。况且，针对《群经平议》稿本与刊本关系的问题也颇有说明力：倘若刻工用了其他的本子作为底本，就不会发生这个情况，唯独华师大这个“多勾画圈点删改之处”的稿本才会导致这类的视效混乱，致使刻工误漏“因”字。因此得出结论，华师大与国图所藏两个稿本残卷确是《群经平议》刊本的底本。

关于稿本与刻本之间关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便是，稿本对刻本持有何等校勘价值？今天考述的这两种稿本能否帮我们整理出质量更高、价值更大的《群经平议》新文本？答案是肯定的。

此稿本乃是《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所依据的底本，而《春在堂全书》本又是王先谦《清经解续编》所依据的底本（参见下一节“用稿本判断刻本与刻本之间的关系”）。因此，将俞樾《群经平议》稿本与二种传世刻本对比，首要收获无非就是稿本可以校正刊本之众多错漏。从俞氏亲手书写的稿本到《春在堂》本再到《续经解》本三者之间，其文本与校勘质量往往呈现递进恶化的趋向。这就是说，对某一条平议而言，通常是手稿本写对了，《春在堂》本或有小错，再到《续经解》本则错误继续扩大或增多。虽说刊本之误往往不过一二字，但在经学、小学领域中，一字可以关乎微言大义，即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例如卷10《毛诗》有“无酒酤我”一条。俞樾征引古籍如下：“《淮南子·道应》篇‘斲轮大疾则苦而不入。’”国图手稿本明明作“斲”（斲即今之斫字），但《春在堂全书》本将“斲”刻做“斸”。《淮南子》此文的“斲轮”其实是个典故，来自《庄子·天道》篇，原文曰：“斲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① 由此可见，刻本的“　”是个误字，参考国图手稿本便知应当改正为“斲”。更有甚者，《续经解》则夺文，无“斲字”亦无“　”字，只写：“轮大疾则苦而不入。”两种刻本皆误，儒藏整理本也误，查考国图手稿本便能够解决问题。

从手稿本转而为刻本，发生过一系列变化，从此便能看出稿本的价值所在。通过逐条比照得知，大多数变化属于刻工镌刻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讹误与修改。析而言之，这种种变化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具体条例：1、刊本遗漏字句，即夺文；2、刊本增加字句，即衍文；3、刻工误刻文字；4、俞氏手稿本有误，刊本沿用其误；5、手稿本有误，刊本给予补正。下面对各类情况分别加以例证。

凡是稿本上板雕刻时，最常见的一个情况便是刻工遗漏个别的文字，可多可少，叫做“夺文”。《群经平议》刊本的这种情况甚多，查究稿本就可以补苴遗漏。例如卷6《尚书·无逸》篇有“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一条。俞樾做《群经平议》，其格式惯例是先引经文，再引旧注，后加自己评注，即所谓“平议”。几乎每条均遵守此形式。可这条的经文后面未刊旧注而直接出现俞樾的评注。从国图手稿本得知，最初俞氏确实征引旧注，惟刻本刊落。在经文后、平议前俞樾写了“传曰：已欺诞父母，不欺则轻侮其父母。古老之人无所闻之。”《春在堂》本遗漏，今应当据俞氏稿本给予增补。

又如卷11《诗经·思文》篇有“莫匪尔极”一条。俞氏立说，此条的“极”字当做“法”解，谓“‘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言成立我之众民，莫非尔之法制也”。于是就称引古籍做例证。“《殷武》篇：‘四方之极。’《后汉书·樊准传》引作‘四方是则’。”在稿本上俞樾又加了一句解释性的总结，谓“盖极为法，故得为则”。此八字被刻本漏刊，今天的整理者应据此补正。

刊本也有增加字句之例，并有误加的（即所谓“衍文”），也有为了润色词句而增订的。例如卷7《周书·祭公》篇有“维天贞文王之董用威”一条。俞樾按语全文移录如下：“此本作‘维天贞文王［句］董之用威’，故孔注曰：‘董之用威，伐崇黎也。’今本‘董之’二字误倒，当据注乙正。孔解‘贞’字之义未得，贞当训定。《释名·释言语》曰：‘贞，定也。’文王之

---

① 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10年，第121页。

时，天命已定矣，故曰贞。”在稿本上，下半条从“孔解贞字之义未得”往下一直到头，都被圈去表示删除。刻本依然保留，应视为衍文，今天整理者当删。

又如卷 11《诗经 · 烝民》篇有“衮职有阙”一条。手稿本写“职、识古字通也”，《春在堂》本加一个“用”字，作“职、识古字通用也”。如此加字未必是错，可以视为润色辞藻。

又如卷 16《仪礼 · 聘礼》篇有“西夹六豆，设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东醓醢屈”一条。此条有图案，图前说明：“今为图明之如左。至堂上所设，旧说无误，故不列焉。”刻本的“至堂上所设，旧说无误，故不列焉”乃稿本所无，即是刻本补充的解释性语句。

凡手稿本上板雕刻时，难免刻错字，《春在堂》本的《群经平议》亦有之。与稿本校对，便发现刊本中的错字不乏其例。卷 3《尚书 · 皋陶谟》篇有“简而廉”一条。其传文曰：“性简大而有廉隅。”俞樾平议下按语，道：“凡人性过于简约，则无等威，易于无别。”这句话当中的“人性”误刻为“人惟”。不光是原初刻工镌刻有误，且王先谦《清经解续编》本以及儒藏整理本《群经平议》均未发现其错，各本皆沿用旧误。唯今天核查稿本便会加以纠正。

卷 9《诗经 · 鸨羽》篇有“肃肃鸨行”一条。俞氏平议有一句话：“鬲声古音在支佳部”，刻本误作“古音在支隹部”。卷 10 又有类似的实例。《诗经 · 四牡》篇，平议中有两个“隹”字，《春在堂全书》的刻工把第二个“隹”“刻成”“佳”（《续经解》本及儒藏本则把前后两个都误作佳）。“佳”、“隹”两个字形近易混，但对音韵考证而言，则区别很大。两个刊本和现代整理本的错字，唯有核对国图的手稿本方能矫正。

又如卷 12《周官 · 酒正》篇有“一曰事酒”一条。据刻本，俞樾按语中写道：“昔酒久酿乃孰。”此“孰”字当作“熟”。国图手稿本原作熟，考之上下文，悉言酿酒之事，“久酿乃熟”，于文义方足，则知道稿本对，刻本误。其次，俞氏这里引用的是贾公彦《正义》，核对原文，确然作“熟”。

还有一种版本之间的关联，就是刊本沿袭俞氏手稿本之误。这类情况在全书中有不少处。例如卷 4《尚书 · 微子》篇有“好草窃奸宄”一条。稿本、刻本俱引《吕氏春秋》篇名，误做“辨土”，实则当作“辩土”（笔者按，《续经解》本、儒藏本也未发现此误）。

又如卷 5《尚书 · 梓材》有“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涂丹雘”一条。俞樾征引经文有误，手稿本作“惟其涂暨茨。”此“暨”是白字，当作“塈”。付刻《春在堂》时，仍作“暨”；王先谦《续经解》本往往能够查出经文的文字讹误，可这次没有发现，依然误作“暨”。

又如卷 11《诗经 · 雝》篇有“宣哲维人，文武维后”一条。俞氏先引郑《笺》作“宣，徧也”。稿本误引郑《笺》用“偏”字，《春在堂》本未查，沿其误。今据《十三经注疏》本的《诗经》及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当做“徧”字。

当然，稿本与刊本之间互相参照、补正乃是双方向的互动。不仅稿本可以用来纠正刊本之误，我们也能看到刊本当时对手稿本之错误所做的纠正。由于种种原因，俞樾撰写《群经平议》时会出现各类讹文，其中一部分在付梓上板过程中得到及时发现和矫正。

例如卷 4《尚书 · 微子》篇有“好草窃奸宄”一条。平议中引用清儒孙星衍，稿本误做“孙声衍”。笔者怀疑，因上文先引江声而下文误用“声”字。无论何种原因，刊版时已被发现，改正为“孙星衍”。

又如卷 9《诗经 · 伐柯》篇有“笾豆有践”一条。传文做“行列貌”。稿本引传文误做“行例貌”。刻本予以纠正。

又如卷 13《周官 · 士师》篇有“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灋治之”一条。平议引用《庄子 · 逍遥游》篇，再引《释文》进一步阐释原文。可俞氏手稿本没有写“释文”反而误做“郭注”，刻本改正为“释文”。

又如卷 23《公羊传》桓公七年有“贵者无后待之如初也”一条。稿本盖因涉上文许多

“體”字而把“以侯伯之禮待之”误写作“以侯伯之體待之”,《春在堂》本已给予刊正。

以上各条例证属于一切刻本最常见的几种校勘谬误，诸如夺文、衍文、错字之类。① 在《春在堂》本与《续经解》本的《群经平议》中每一类情况均可以找出若干实例，今文只挑出二三例以作说明。除了上述几种情况以外，还有些校勘和版本上的特殊现象，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但因为其出现频率相对低而难以归纳为独立条例。譬如说刻本对稿本的原文有所润色与改动，但不分对错。卷 15《仪礼 · 乡饮酒礼》篇有“主人阼阶上，当楣，北面再拜”一条。此条末句谓“自《尔雅》误‘ ’为‘楣’而学者遂不知楣、 之有辨矣”。稿本上则写：“学者遂懵然于楣、 之有辨矣。”即刊本将稿本之“懵然于”改为“不知”。二者皆通，盖属上板过程中临时订正；其于义理无大差异，但不是原貌。

以上基本都是稿本与刻本之间不应当有而偏偏存在的出入差异，属于人工造成的异文，导致了传世刻本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凭借手稿本，细心校对一番，方能纠正那些误处，进而存真复原。还有一种情况能够显示稿本的价值，便是刊文。俞樾经常写完一整条《平议》的内容，回头把全部或者其中一大部分文字统统删掉。俞氏删掉的理由我们只能猜测：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论断已经表述好了，若加上过多的文献旁证就会显得啰嗦、画蛇添足；或者该条论据不足，未能成立，于是就圈去了。对我们今天研究经学课题的学者来说，这些刊文仍然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国图稿本残卷与华师大稿本残卷含有数十条刊文，兹举几例，以示一斑。

故殷礼陟配天。(国图稿本卷 6,《尚书 · 君奭》篇)

传曰：故殷礼能升配天。

樾谨按：夏殷之君，生虽称王，死则称帝。故《史记》于夏、殷《本纪》无不称帝者。《礼记 · 曲礼》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郑注曰：“同之天神。”然则殷礼陟配天者谓殷人之礼，死则以配天而称帝也。《竹书纪年》凡帝王之终，皆曰陟。此经“陟”字与彼同义。言殷有贤臣，为之辅左（佐），故有殷之君，无失德者，死则配天称帝。其子孙享国长久，多历年所也。传义未得。

饰皮车。(国图稿本卷 12,《周官 · 司裘》篇)

注曰：皮车，遣车之革路。

疏曰：饰皮车者，亦谓明器之车以皮饰之。

樾谨按：疏解“饰”字，非也。饰即《封人》“饰其牛牲”之“饰”。注曰：饰谓刷治洁清之也。

重罪旬有三日朞役。(国图稿本卷 13,《周官 · 大司寇》篇)

樾谨按：下文云“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日数与月数皆相当。疑此文当作“旬有二日”则与朞之月数相当矣。

在官言官。(华师大稿本卷 19,《礼记 · 曲礼下》篇)

注曰：官谓版图文书之处。

樾谨按：此“官”字当读为馆，故郑释为版图文书之处。古官、馆同字，说详余所著《字义载疑》。《周易》随初九“官有渝。”《释文》曰：“官，蜀才本作馆”，是其证也。

---

① 《春在堂》本的《群经平议》也有乙文现象，亦即倒文，可是我们所发现的实例俱在手稿本卷数范围之外。因为没有利用手稿本发现和纠正这类错误，所以没有在本篇正文中论说。在兹不妨举例：卷 1《周易 · 初六》“榦父之蛊”一条引用唐代颜师古的书《匡谬正俗》，然二刻本咸倒置字序，作《匡俗正谬》。

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华师大稿本卷 22,《礼记·祭义》篇)

正义曰：当此之时，必有忾息，肃肃然如闻亲举动容止之声。

樾谨按：声可闻，容不可闻。容当读为搈。《广雅·释诂》曰："搈，动也。"连言之则曰动搈。《说文·手部》"搈，动搈也。"《孟子·尽心》篇"动容周旋中礼者。"动容即动搈，古字通也。"有闻乎其容声"，盖谓闻其动搈之声。《正义》不知容即是动，乃增成其义，曰："举动、容止之声"，失之矣。且"容止"二字见《月令》，注曰："容止犹动静也。"然则"举动、容止之声"是"举动、动静之声"矣，其语岂可通乎?

尊仁安义（华师大 稿本卷 22,《祭义》篇)

正义曰：尊重于仁，安行于义。

樾谨按：尊当读为遵。《论语·尧曰》篇"尊五美，屏四恶。"《后汉书·祭遵传》作"遵美屏恶。"汉平都相蒋君碑作"遵五迸四。"皆汉人读尊为遵之证。遵仁犹依仁也。非尊重之谓。《表记》篇"尊仁畏义"亦然。

国图稿本与华师大稿本均有刊文若干条，对于经学研究、文字学研究，都有莫大的价值。并且将这些刊文与刻本《群经平议》所保存的考据工作结合起来看，则能更加充分地反映俞樾的经学思路和整个治学风格。

五、用稿本判断刻本与刻本之间的关系

《春在堂全书》最早刻于约 1871 年，王先谦的《清经解续编》刻于 1888 年，一前一后，二者的时间顺序从不是问题。但我们可以提出疑问，到王氏刊刻《续经解》本的时候，他是参照了俞樾的手稿而刻《群经平议》，还是直接使用《春在堂》本而刻的?《续经解》序言对此没有说法。通过对三种本子的比较与分析，笔者得出结论，即《清经解续编》本一定是根据《春在堂》本而刻的。据研究，以下几种现象可以证实这一点：一、《春在堂》本若有刻错之处，则《续经解》本往往沿用之；二、《春在堂》本若误漏文字，则《续经解》本也误漏；三、《春在堂》刻本若对稿本增加字句，则《续经解》本也增加；四、《春在堂》本若对稿本进行改动或改正,《续经解》本也沿用；五、如若《续经解》本纠正了《春在堂》本的错误，那些《春在堂》本的错误是不需要查看作者原稿就能解决的问题，即这些错误基本上都属于查古经古注便会解决的问题；六、在《春在堂》本基础上进行重刻,《续经解》本会出现新的错字。下文分别列举例证。

《春在堂》本刻错之处,《续经解》本往往沿用之，继而刻错。例如卷 7《逸周书·大武》篇有"五远宅不薄"一条。俞樾引用本篇的另一段文字，其中有一句："同恶相助。"虽然稿本是这么写的,《逸周书》原文也是这么写的，但《春在堂》本误刻做"同恶相取"。《春在堂》本显然因形近而误作"取",《续经解》本未查，也误做"取"。

又如卷 11《诗经·荡》篇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条。在平议中俞氏又重复经文时,《春在堂》本误作"在夏侯之世"。(笔者按,《群经平议》上一条有六个"侯"字，怀疑因涉及上条而把此条"后"字误刻成"侯"。)《续经解》本也跟着刻错。

《春在堂》本如果遗漏文字,《续经解》同样遗漏。例如卷 5《尚书·康诰》篇有"无康好逸豫"一条。《传》曰："无自安好逸豫宽身，其乃治民。"在《春在堂》刻本中，俞氏平议谓："此经'豫'字，即涉传文而误衍耳。《汉书·武五子传》'母桐好逸'，盖康声转而为空"云云。查之国图稿本便发现，下半段文字当做"《汉书·武五子传》'母桐好逸'，盖即引此经文。康声转而为空"云云。《春在堂》刻本遗漏"即引此经文"五个字，如今增补则文从字顺多了。

虽《春在堂》本不尽通顺，然《续经解》本照搬重刻，依旧有夺文。

又如卷 11《诗经 · 那》篇有“于赫汤孙”一条。《传》曰：“于赫汤孙，盛矣汤为人子孙也。《笺》云：汤孙，呼太甲也。”平议之结论谓：“若从郑义以为大甲，则岂有不美其所祭者，而反盛称主祭者之美乎？后人舍毛而从郑，失之甚矣。”从国图的稿本可知，“之美乎”之后有一句长话，为“《诗》中三称汤孙，而毛公独于此句发传，自有深意”。这十九个字是在手稿本行间用小字写的，被刻工忽视了，未刻入《春在堂》本，从而《续经解》本也未收入。

《春在堂》刻本若对稿本增加字句，则《续经解》也增加。例如卷 15《仪礼 · 士婚礼》篇有“主人筵于户西”一条。此条末句为“《疏》因经文‘西’字而以地道尚右，为说失之迂曲矣”。句中的“迂曲”二字乃稿本所无，刻本所加。《春在堂》本既加，《续经解》亦有。

又如卷 24《谷梁传》隐元年有“聘弓鍭矢，不出竟场”一条。平议中有一句，谓“‘聘弓候矢’谓以弓聘问，以矢候视也”。这十四个字未见于稿本，是《春在堂》刻本增加的，《续经解》也增加。

《春在堂》本对稿本所做的改动和改正，《续经解》本也照搬沿用。譬如说在《诗经》那部分，即全书的卷 8 到卷 11，俞樾所引的旧注有毛《传》、郑《笺》、孔《疏》三种，而引用郑《笺》时，稿本或做“笺曰”，或做“笺云”，写法不定。《春在堂》本几乎统一为“笺云”，极少数处保留“笺曰”二字。《续经解》本也继承了这个做法，大体都做“笺云”。

卷 24《谷梁传》庄三十二年有“讳莫如深，深则隐”一条。平议中谓：“《传》文本明，范氏所解未得其指。”此“指”字，稿本写“旨”，《春在堂》本改从提手旁，《续经解》也从之作“指”。

这些小小的文字改动与校勘事例，不一定会影响到俞书的思想，然而在校勘学、版本学等方面即具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所发现的一切实例都有力地表明，王先谦等人刊刻《清经解续编》本的《群经平议》时，绝没有参考原作者的手稿，也未对照其他本子，很明显全照着《春在堂全书》本加以重刻。按理说，在某一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重刻，这后来的版本或可以通过学者的细心雠对与修改而成为“精校本”；或因为学者与刻工的疏忽大意而成为原版的次等复制品。王先谦《清经解续编》本的《群经平议》就属于后一类。对《春在堂》本的各种错误与改动，《续经解》本大都以讹传讹，并且又有新的讹误。

有时候，《春在堂》本有误字，《续经解》对此加以矫正，但就此我们要说明两点。第一，这样的情况比较罕见，比起《续经解》本所出现的新错误要少得很多。第二，《续经解》本所改正的是《春在堂》本最明显的谬误，其中往往是经文或旧注写错了而不是俞樾的按语写错了，这就意味着，《续经解》本还是没有参考俞氏手稿本，而是查阅经书的正文和注文后发现其误。例如卷 3《尚书 · 益稷》有“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女听”一条。俞氏引《传》文作“仁义礼智信五德”，唯《春在堂》刻本误漏“信”字，《续经解》本为之增补。此种补正不用参考手稿或其他版本就能查出，一则可以查旧注，二则“仁、义、礼、智五德”明明不全，一看便知有误。

又如，同一条末句，俞樾引用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稿本直作“段氏《撰异》”，《春在堂》刻本误作“叚氏《撰异》”，《续经解》给予改正。与上例一样，这次《续经解》改正了《春在堂》本的旧误并不代表《续经解》编纂者王先谦等人核对了俞樾的稿本，这样的过错本来明显得很。

对于俞氏平议内容本身的错误，《清经解续编》本所改正的仍然是那些明显的误字，同样不需参考他本，也不需经过特别精细的校对才能发现。例如卷一《周易》卦六四有“东邻杀牛”一条。平议一句谓“其字变作‘禴’，不从水而从示”。可是《春在堂》本原误从衣字旁。只要阅读下文对该字的描述“不从水而从示”，便知道必从示作“禴”，不从衣。《续经解》校勘者已发现并予以纠谬。

从以上几条例证来看,《春在堂》本与《续经解》本的文本样貌大同小异。可二者之间也可以分出上下，因为《续经解》本在《春在堂》本的基础上予以重刻重印时，雕版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错字、夺文等校勘讹误。例如卷 7《逸周书 · 程典》篇有“乃作程典，以命三忠”一条。稿本、《春在堂》本都写着“卢说恐未足据”，唯独《续经解》刊本刻错，作“末足据”，形近致误，校勘不精。

卷 11《诗经 · 殷武》篇有“裒荆之旅”一条。俞氏先引用毛《传》，稿本与《春在堂》本悉作“裒，聚也”。唯《续经解》误做“裒，眾也”，因形相近而误。

又如卷 16《仪礼 · 特牲馈食礼》篇有“嗣举奠，盥入”一条。《春在堂》本的平议提及“尸”一字,《续经解》本误作“尺”。

此种例证表明,《续经解》的《群经平议》文本对于《春在堂》的文本没有多少改良之处。《春在堂》本原有什么文字讹误,《续经解》本大抵都沿用之。《续经解》本的少数纠正也只不过是那些最明显、最易发现的错误。由此，我们对王先谦《续经解》中《群经平议》的总体评估是：没有做到精审详校，失误较多，文本价值次于《春在堂》本。

六、结语

总结本文的主要论点，俞樾经学大作《群经平议》具有三种刊本：俞氏总集《春在堂全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和王先谦《清经解续编》本。三者之中,《春在堂》本为时最早，清晰度最高，并自附校勘记，实为今天整理《群经平议》的最佳底本。除此之外，国家图书馆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群经平议》手稿本，均为残卷，合起来看系全书 35 卷中的 19 卷。有很大的可能性，这两个手稿本就是《春在堂》刻本的底本，因此其校勘价值尤其高。具体言之，我们可以利用稿本来发现并勘正刻本的多种文本讹误，诸如夺文、衍文、错字之类。我们还能用稿本来判断刻本与刻本之间的关系。由于《春在堂》本的文本错误在《续经解》本里得以承袭，况且《续经解》本又出现了新的错误，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王先谦《清经解续编》本完全依照《春在堂》本而加以重刻，没有给予精细校勘，也未参考手稿本。《续经解》本的《群经平议》文本价值远逊于《春在堂》本。

这些版本的对照与考证的成果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在经学领域中，可以将一部经学名著的文本进一步推敲、改善，存真复原，给今后学者提供更为完善的读本；同时有助于阐明发挥俞樾的经学思想。其次，在版本学领域中，这是个重要教训：古书均有不同版本，版本与版本之间校勘水平不一，学术价值有差。研究某书之思想之前，务必澄清版本之间的关系，排列先后，分辨优劣，即所谓列异同、断是非。做到了这一点，读者研习古籍便可事半功倍。

References

Dong Zhi'an ed. *Jing bu yaoji gaiyao* (Summaries of key Classics).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2008.

Du Jifang. “Shi lun Yu Yue de jiaokanxue chengjiu” (Yu Yue's achievements in Textual Scholarship). *Xihua shifan daxue xuebao* 3 (2009).

Guo Pengfei. “Yu Yue ‘*Qunjing Pingyi · Chunqiu Zuozhuan*’ Bianzheng wu ze” (Five Corrections on Yu Yue's ‘*Qunjing Pingyi Chunqiu Zuozhuan*’), collected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 Xue.

Hammer, Benjamin. “‘Bi xian ding diben zhi shifei’ — pinglun ruzangben *Qunjing pingyi* de banben xuanze” (Some commentary on Ru Zang's Version of *Qunjing Pingyi*). *Tushuguan zazhi* 34, no. 7 (2015).

Hammer, Benjamin. “Jingxue jiaokan shili: dui ruzang *Qunjing pingyi* wenben de shangque” (Cases in Classical Textual Criticism: Discussing the Text of Ruzang's *Qunjing Pingyi*). *Zhongguo jingxue* 16 (2016).

Han Jin. “Yu Yue de ‘*Chunzaitang Quanshu*’ gaoben” (Yu Yue's manuscript version of *Chunzaitang Quanshu*).

Huadong shifan daxue xiaobao (electronic version), March 22, 2011.

Luo Xiongfei. "Yu Yue jiaoshi qunjing, zhuzi de de yu shi" (Evaluating Yu Yue's methods of Textual Scholarship on Classical and Philosophical texts). *Huzhou Shifan Xueyuan Xuebao* Vol. 6 (2005).

Sun Liangming. "Tan guwen xungu zhong de yuyi guanxi fenxi—jianshu du Yu Yue *Zhuzi Pingyi*, *Qunjing Pingyi gan*" (Some thoughts after reading Yu Yue's *Zhuzi Pingyi* and *Qunjing Pingyi*). *Guji zhengli yanjiu xuekan*, 3 (1997).

Xu Shichang, *Qing Ru Xue An.* Printed by Beijing Zhongguo Shudian, based on the woodblock version from the 28th year of Republican China (1939).

Wang Qihe and Wang Mingchun. "*Qunjing pingyi* xungu shiwu juli" (Commentarial mistakes from Yu Yue's *Qunjing pingyi*). *Dezhou xueyuan xuebao*, 6 (2006).

Zhang Yanyin. "Gaoben *Chunzaitang shibian* canjuan shulüe" (A report on the partial manuscript of Yu Yue's *Chunzaitang Shibian*). *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3 (2010).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Yu Yue's *Qun Jing Ping Yi*

Ben HAMMER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benkhammer@sdu.edu.cn)

Yu Yue was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and talented schola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His corpus of works included commentary on a large number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compiled in his well-known work *Qun Jing Ping Yi*. Since its first printing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Qun Jing Ping Yi* has always remained in wood-block print form only.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is book have different value, in that the collation and redaction work that went into the different versions ranged from meticulous to slopp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various editions and explains their differences, both in major editing principles and in subtle textual details. This analysis draws heavily on Yu Yue's hand-written manuscript of *Qun Jing Ping Yi* which, while only partial, is of enormous academic value.